

文稿

敦煌蒙書的儒教思想

任允松*

一、前言

自王圓籙打開藏經洞，史坦因、伯希和的劫經起，塵封於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一千餘年的五萬多卷寫卷，終得以重見天日，重現於世人眼前。也因這批寫卷之功，敦煌這個曾經輝煌的邊陲都市得以再次於當今舞台上發光發熱，沈寂已久的莫高廢墟，也再次受到國際間的矚目。在學界前賢的筆路藍縷之下，「敦煌學」一躍成為國際間一門涵蓋繪畫、雕塑、建築、文學、藝術、宗教……等多領域的綜合性學門。

在這五萬多卷的寫卷當中，摒除近九成的佛教及宗教性典籍，在論及其餘的文獻時，學者們的眼光與研究方向，最初放在俗文學的研究上，甚至有以「敦煌俗文學」統稱整個敦煌文學範疇的論點。然而，在眾多寫卷裡，有一批遭人們忽視、遺忘已久的文獻，有幸在敦煌學者的鑽研下，重新付予其新的生命與歷史定位，這批文獻，學界統稱其為「敦煌蒙書」¹。

對於蒙書，一般人的傳統觀念認為它是供孩子讀的小兒書，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村書，僅僅是教人識字、認物的工具，而敦煌蒙書不過是在敦煌出土的蒙學讀本。然而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敦煌蒙書卻有其獨具的特色，且深蘊著中國儒家的禮教道統。敦煌蒙書的教化功能與其內容的道德偏執性，更是其他文學載體所望塵莫及的。本文擬以此一特性為題，從眾多的敦煌蒙書中，引例說明之。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一書共計敘錄敦煌蒙書25種，凡250件抄本，分為三大類，即：(1)識字類：《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開蒙要訓》、《百家姓》、《俗務要名林》、《雜集實用要字》、《碎金》、《白家碎金》、《上大夫》，凡9種，106件抄本。(2)知識類：《雜抄》、《孔子備問書》、

* 玄奘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¹ 對於敦煌蒙書的界定，諸家學者各有所見；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及日人東野治之〈訓蒙書〉，皆以寫卷題記中的「學士郎」、「學郎」、「學生」、「學士」，為寫卷性質的判定標準。《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臚列26種。敦煌研究院汪泛舟《敦煌的童蒙讀物》臚列36種。鄧嗣禹《中國類書目錄初稿》專立『蒙求門』。敦煌蒙書界定的分歧，主要在於其與類書之間的模糊地帶，如就廣義而論，敦煌寫卷中，只要具有啟蒙功能的，皆可視為敦煌蒙書。

《蒙求》、《古賢集》、《兔園策府》、《九九乘法歌》，凡6種，34件抄本。
(3)德行類：《新集文詞九經抄》、《文詞教林》、《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辯才家教》、《新集嚴父教》、《崔氏夫人訓女文》、《一卷本王梵志詩》、《夫子勸世詞》，凡10種，110件抄本²。《敦煌蒙書研究》此書，對於所引論的敦煌蒙書，皆已做了詳盡的校錄、勘誤及作者、編寫者與創作年代的分析探討，是故本文所引敦煌蒙書的原文，除少數特別標明出處者外，皆源自此書，特此說明。

二、敦煌蒙書的分類與編纂形式

(一)敦煌蒙書的分類

敦煌蒙書作為敦煌地區各類學校³的教材，其中有不少自中原地區傳入，因而其所反映的不僅是敦煌地區的特殊情況，而且也適度地反映出當時中原地區蒙學的一般情況。由於蒙書發展流衍至唐代，不論內容亦或形式上都已漸趨多樣，因此對於敦煌蒙書的分類，諸家學者各有不同的分法與見地。蒙書本為小學支流餘裔，至後世而萌生多方，遂與原本圖書分類中的「小學類」日漸分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序云：

古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入小學。《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書法、書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相參並列，而小學亦多岐矣。

而後，余嘉錫《內閣大庫本碎金跋》將古之小學析分為「字書」、「蒙求」、「格言」三類，並對蒙書的性質、源流、類別有明確的論述。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⁴，將隋唐時代的蒙書分為「識字教育」、「思想教育」、「知識教育」三大類。汪泛舟〈敦煌的童蒙讀物〉，將敦煌蒙書分為「識字」、「教育」、「運用」三類⁵。錢加清〈我國古代蒙學教材特點檢析〉

² 鄭阿財、朱鳳玉撰，《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5。

³ 敦煌地區的學校依不同時期，有縣學、州學、寺學之分，其輕重與規模亦隨統治當局而有所消長，詳見鄭阿財、朱鳳玉撰，《敦煌的學校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 年 12 月。

⁴ 張志公，《張志公文集(4)傳統語文教學研究》，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1991 年 1 月。頁 7。

⁵ 汪泛舟，〈敦煌的童蒙讀物〉（《文史知識》，1988 年 8 月），頁 104-107。

⁶，將古代蒙學教材區分為：「綜合類」、「倫理類」、「歷史類」、「詩歌類」、「名物類」、「工具類」六大類。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分為：「識字類」、「知識類」、「德行類」三類。張永萍〈敦煌古代教育思想芻議〉⁷，依據敦煌蒙書的教育功能，分為「識字」、「知識」、「教化」、「應用」四類。上述眾多的分類，其實就是從蒙書的「體」與「用」著眼。再觀張永萍所分的「教化類」與鄭阿財所分的「德行類」，⁸書目內容完全一樣，這一點即說明了傳統蒙書的教化內容就是以品德教育為中心精神。這也突顯出敦煌地區童蒙讀物的豐富內容和多樣性題材，雖極具地域特色，卻也離不出中原傳統中國的母體思維。而這個母體思維正是維繫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穩健運作，支持宗族家庭倫常秩序的儒學道統，也正是本文所要論述的敦煌蒙書其所內蘊的教化思想。

(二)敦煌蒙書的編纂形式

敦煌蒙書以不同的體式編纂，具備不同的功能性與教育目的。本文依據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一書的內容，將多種敦煌蒙書的形式、特色及主要內容作一簡表，以供讀者能快速、清楚地認識每一種敦煌蒙書。

書名	形式、特色	主要內容
《新合六字千文》	1.1500 字。 2.於《千字文》每句各加兩字。 3.六字一句、對偶押韻，屬於《千字文》的續作改編之流。	同《千字文》歷敘天地、氣象、博物、社會、歷史、倫理、教育等方面知識。
《開蒙要訓》	1.1400 字。 2.四字一句，兩句一韻。 3.350 句，175 韻。 4.較集中於識字的用途。 5.編撰層次較為通俗，偏重現實生活的知識層面，更能顯出	如同類書的編纂形式，分門別類，內容涵蓋天文、地理等自然名物與知識、人倫關係和生活中的名物與基本知識。可謂一本專為敦煌地區所編寫的百科全書。

⁶ 錢加清，〈我國古代蒙學教材特點檢析〉，《語文學刊》，2001 年，第四期。頁 9。

⁷ 張永萍，〈敦煌古代教育思想芻議〉，《文化教育》，第 34 卷，第 2 期，2005 年。

⁸ 同樣列有《新集文詞九經抄》、《文詞教林》、《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辯才家教》、《新集嚴父教》、《崔氏夫人訓女文》、《王梵志詩》、《夫子勸世詞》。

	庶民教育的特色。	
《俗務要名林》	採取六朝以來類書分類立部的體式，分別部居，標舉名目。	將民間日常生活所需語彙，加以分類編排的字書。
《雜集時用要字》	1.1300 字。 2.義類分部，立有類名。	集合當時現實生活中，重要而常見的生活字詞匯編而成。
《碎金》	1.428 條語詞。 2.全書一卷，以平、上、去、入四聲編排。	正統字書所不載的口語詞彙，收錄民間口語、俗語以及僻字、俗字語彙，每條語詞下注以反切或直音。
《上大夫》	25 字。隨意拼湊成篇，內容無特別意義。	描紅字帖：「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雜抄》	1.五千餘字。 2.以一問一答的形式為主，組織成篇，且多名數，甚為特殊。	廣泛介紹現實生活中最具實用價值的綜合性知識啓蒙教材，可以稱得上是一部生活小百科全書。
《孔子備問書》	以一問一答的形式為主，組織成篇。	全篇 155 則問答，且多為名數，顯為當時佛教典籍所常用的形式。
《古賢集》	1.80 句，560 字。 2.七言詩體。	歌詠歷史人物孝友、勤學、誠信、忠貞等事蹟。
《兔園策府》	1.48 門，10 卷。 2.自撰式的四六駢文。	記敘自然名物、社會名物、人文儀禮、政事爭討等有關掌故方面的綜合性蒙書。
《新集文詞九經抄》	抄撮輯錄各典籍中的精要言論。	輯錄文辭與九經中有助進德修身的嘉言粹語，以為訓蒙誠俗的讀物。
《文詞教林》	抄撮輯錄各典籍中的精要言論。	輯錄文辭與九經中有助進德修身的嘉言粹語，以為訓蒙誠俗的讀物。
《百行章》	自《孝行章》至《勸行章》，共分 84 章，分章立目，約義標題。	以忠孝節義統攝全書，摘引儒家經典中的要言警句，多出自《論語》、《孝經》等書。
《太公家教》	四言韻語，訓誡式的語氣。	教導子弟進德修業，治家立身。
《武王家教》	一問一答的方式。	宣說進德的佳言懿行。
《辯才家教》	帶有濃厚佛教勸世色彩的 家教類蒙	共分 12 章，內容為品德陶冶與行為規範。

	書。每章或托之學士問，辯才答，以發揮意見。然多韻語，五言者如白話詩，七言者如唱經文。四字教章爲四言，五字教章爲五言，甚至還直接採用了佛經中的偈頌形式。	
《新集嚴父教》	五言韻語式的的家訓讀物。	告誡家中子弟日常生活行爲應遵守的規範。
《崔氏夫人訓女文》	七言的通俗韻文。	女子臨嫁時，母親的告誡訓示。
《夫子勸世詞》	五言韻語，二句一韻。	勸世爲宗，內容充滿宿命論的觀點。
一卷本《王梵志詩》	1.有詩 93 首。 2.全篇採五言四句的整齊形式。	內容偏重在生活儀節、處世格言、俗諺等方面。

本表共列 20 種書目，與前述《敦煌蒙書研究》一書所計敘錄敦煌蒙書 25 種相較，少了 5 種：《千字文》、《蒙求》、《九九乘法歌》、《百家姓》、《白家碎金》，蓋因《千字文》、《蒙求》、《百家姓》此三書在後世仍有所流傳，《九九乘法歌》爲一單純的數學公式口訣，而《白家碎金》實爲《碎金》的節錄本，故除此五書，略而不論。

三、敦煌蒙書的特色

蒙學亦稱啓蒙之學或蒙養之學，其義則取之於《易·蒙·彖》所云：「蒙以養正，聖功也。」《尚書·孔穎達正義》：「蒙謂暗昧也，幼童於事多暗昧，是以未知同蒙焉。」所以古人因取其意而稱以教授小學類知識的教育階段爲「蒙養階段」。實際上，蒙學泛指一個特定階段和層次的教學，非僅是指對幼童所進行的早期啓蒙教育，其教育宗旨爲貫穿於我國古代的蒙學教育中的三大目標：啓蒙、養正、入聖。

啓蒙教育既是教育的最初始，自然扮演著基石與扎根的關鍵性角色，而作爲啓蒙教育的媒介，也就是啓蒙教材，無可避免地扮演著上述教化工具的第一線任務。中國傳統啓蒙讀物所呈現的是中國數千年傳統文化以及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縮影，是歷代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教材體系的薪傳。

縱觀千百年來的啓蒙讀物的發展，可發現其流衍經歷，包含類型由教材到普通讀本，體制由官修到民編，功能由單純的識字到多元的綜合類知識，對象由皇室貴族到平民百姓，以及體式由純文字到圖文結合的種種演變。而敦煌蒙書正處於這股流衍潮流中的一個分水嶺，因為它上承先秦、兩漢的傳統字書的形式與識字的單純性教育目標，下開宋、元、明、清形式多元且教育層次加深加廣的先河。顏佳琪〈中國古代蒙學教材的發展狀況及其特點〉⁹，對中國古代蒙學教材歸納出六大特點，其中許多特點皆為敦煌蒙書所具備，甚至其所舉的例證多有從敦煌蒙書所出，故筆者即以此文為基礎，對敦煌蒙書的特點作一推衍分析，而得出敦煌蒙書具備以下特色：

1. 識字教學與品德培養的緊密結合

敦煌蒙書的內容，除側重生活知識及識字外，同時也技巧性地灌輸一定的思想內容和品德要求，如《百家姓》、《千字文》、《開蒙要訓》。有側重進行品德培養，但未忽視知識教學的，如《新集文辭九經抄》、《百行章》、《古賢集》。這幾部書不僅是兒童的識字教材，更是一部集萃古代文化知識的百科全書，這正體現了敦煌蒙學教材識字教學與品德培養緊密結合的特點。

2. 敦煌蒙書作者多不可考

二十餘種的敦煌蒙書，除《開蒙要訓》為馬仁壽所撰，《蒙求》為李瀚所撰，《兔園策府》為杜嗣先所撰，《百行章》為杜正倫所撰，其餘作者，多不可考。敦煌蒙書的編纂，主要在於切合民間日常生活的需要，內容以實用、通用、便用為主，故常出現語多俚野、字多鄙俗的現象。一般而言，敦煌蒙書的編、撰者姓氏多無可考定，成書年代也不易確知。其中縱使有書名或作者署名涉及名人雅士者，也多屬依托掛名，並非真正出自其人之手。

3. 因時、因地制宜

敦煌蒙書內容穩定中有變化，不斷地進行修定增補和更新，從而適應時代發展與地域特殊的需要。例如《新合六字千文》、《雜集時用要字》、《新

⁹ 顏佳琪，〈中國古代蒙學教材的發展狀況及其特點〉，遼寧：《教育研究》，2001年，第9期。

集文辭九經抄》、《新集嚴父教》等，正是由於不斷修訂、增補和更新，才保持了敦煌蒙學教材的穩定地位，從而提高了人們的信任感、與依賴性。

4. 適合兒童年齡和心理特點

中國古代還沒有系統的兒童心理學和發展心理學的知識，但敦煌蒙學教材的編寫卻非常注意兒童年齡和心理的特點，例如：教材力求淺顯易懂，形象具體，生動活潑，切於實用。各書都注意以典型人物、歷史故事、民間諺語、流行成語等作為重要內容，甚至相當符合現代的教育理論、目標與宗旨¹⁰。

5. 內容、形式雅俗共賞、老幼皆宜

這是敦煌蒙學教材在當代極為普及的一個重要因素。許多優秀的蒙學教材，不僅是蒙以養正的兒童讀物，也是成年人喜愛的讀物，從而增強了蒙學教材的實用效率。兒童不僅由學校教師傳授，同時，父母兄長、鄰里親友，以至整個社會都熟讀這些蒙學教材，也就都於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無意間地成了兒童的教師。

6. 突出的地域性

敦煌地處西陲，自然與人文環境與中原有著截然不同的差異，儘管如前所述，整個思想淵源與中原有著密不可分的臍帶關係，但是在語言、習俗、物產……等方面，仍有極大的差異。是故如將中原地區所生產的童蒙讀物完全移植到敦煌地區，將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因此，敦煌當地就出現了專為敦煌量身訂做的童蒙讀物，如：《開蒙要訓》、《俗物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辯才家教》……等。其中內容、名物、俗語、用字，都是敦煌這個西北地區所慣用而獨有的¹¹。

7. 針對不同的閱讀族群編寫

雷僑雲《敦煌的兒童文學》一書，將《太公家教》、《開蒙要訓》、《崔氏夫人訓女文》等書列為是針對兒童所編寫的教材，甚至將其歸為兒童文學，姑且不論這樣的歸類是否妥切，但是敦煌蒙書的編寫對象確實有其特定族群，例如：《開蒙要訓》淺顯通俗，內容偏重於生活上的日常知識，

¹⁰ 詳見羅宗濤、任允松，〈敦煌蒙書的時代性〉，《敦煌學輯刊》，第廿七輯，2008年2月。

¹¹ 羅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即是援引《開蒙要訓》中的音注進行研究的成果。

具有明顯的庶民教育特色。¹²敦煌的啓蒙讀物並非針對幼童，其實更大部分所針對的是文化教育水平較為基層的平民百姓。此外更有如《崔氏夫人訓女文》這種針對女子所編寫的教材，以及針對家中子弟所編寫的教材，例如：《新集嚴父教》、《太公家教》、《武王家教》。

具備如此多層面向的特色，無怪乎敦煌蒙書一直影響著後世蒙書的編寫。正因如此，敦煌蒙書在其價值上早已遠遠超乎小兒書的教材角色，其內涵已從單純的知識面，擴及到教育、文化、語言、思想、政治，甚至是哲學的層次。

四、敦煌蒙書的教育內容

敦煌地區因為佛教盛行，寺院眾多，且各寺院多有興辦寺學，因此當地學子就學於寺院的風氣鼎盛。加上教授者常為寺院的僧侶，因此其所傳授的教材與內容，不免含有佛教的信仰與思想在其中，如《王梵志詩》中的「煞生罪最重，吃肉亦非輕。欲得身長命，無過點續明。吃肉多病報，知者不須餐。一朝無間地，受罪始知難。造酒罪甚重，賣肉亦非輕。若人不信語，撿取涅槃經。偷盜雖無命，侵欺罪更多。將他物己用，思量得也磨？世間難割捨，無過財色深。丈夫需達命，割斷按迷心。邪淫及妄語，知非總勿作。但知依道行，萬里無迷錯。」清楚告誡戒殺、盜、淫、妄、酒的佛家思想。《辯才家教》是一本由佛門中人所編寫，內容兼及佛門與世俗的通俗蒙書。除此，《新集文辭九經抄》序言「包括九經，羅含內外」一語，更是流露出敦煌蒙書雜糅三教的思想特質。

敦煌蒙書的教育對象，並非單純的孩童或是青少年，也不限定是出家眾亦或是一般庶民大眾。廣義說來，含括了沒有被「禮教」開化的民眾，施教者希望藉由蒙書為媒介，讓受教者都能「止乎禮義」，按照「道德」的精神、行為規範、儀式準則而生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敦煌蒙書的內容除了「識字類」及前述所提的「釋家思想類」外，大部分都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依歸。其主要論述主軸不外是：忠臣、孝子、烈女、貞婦等儒家理想道德人格。

本文從傳統儒學觀點切入，將敦煌蒙書的教育內容，分為「道德規範」與「修身養性」兩大部分進行論述，其中「道德規範」再分為「對尊上」、

¹²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66-67。

「待平輩」加以闡述，「修身養性」則分為「忍」、「勤」、「儉」、「慎」、「禮」五部分加以闡述。因本文所論述的敦煌蒙書為數眾多，礙於篇幅所限，僅酌引較具代表的部分以為論證。

(一)道德規範

在傳統儒學的教化、薰陶下，道德規範早已凌駕了一切的法條規章。上至皇戚國族，下至販夫走卒，都受到了此一無形卻又極具約束力的規範。這是一股內化的力量，在傳統中國社會裡的每一個人人都受其影響。道德規範沒有明訂法條與獎懲，但歷代典籍、蒙書、家訓中，卻清楚釐清著人與人之間的份紀。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警戒線，一旦逾越，「違背道德」的罪過，是任何人都背負不起的。這道份紀包括了「對尊上」的「忠」與「孝」，及「待平輩」的「恭敬」與「和睦」。

(1)對尊上的「忠」

「盡忠」的對象是「國」與「君」，而君權時代的君等同國。故君臣之道列為五倫之首，忠是為人臣者對國君的唯一表現。忠君愛國思想，更是在君權至上的中國傳統社會所強調的最高法則。《百行章·忠行章》：「身沾高位，倍須持志優君。臨危不改其心，處死不懷其恨，當陣不顧其軀，聘使不論私計。」強調為人臣者，需效忠君王，別無二心。《開蒙要訓》中強調君臣之道：「君王有道，恩惠弘廓。萬國歸投，兆民歡躍。諂佞潛藏，奸邪憩惡。臣佐輔弼，匡翊勤恪。賞賚功勳，封賜祿爵。」說明如何當一個明君與賢臣。

(2)對尊上的「孝」

「盡孝」的對象是「父母」。百善孝為先，對於孝的重視，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特有表現。從《孝經》列為唐代科舉考試的必考科目、唐太宗親注《孝經》看來，對於孝的重視是從上至下一脈相承的。孝，可以說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條件，更是所有美德的出發點。《百行章·前序》明言此書著重忠、孝的闡發：「雖讀不依，徒示虛談，何益存忠？則須盡節立孝，追遠慎終。至於廣學不仕明朝，侍省全乖色養；遇沾高位，便造十惡之衍；未自勵躬，方為三千之過。臣每尋思此事，廢寢休，故錄要真之言，合為《百行章》一卷。」同書《百行章·孝行章》：「孝者，百行之本，德義之基。以孝化人，人德歸于厚矣。在家能孝，於君則忠；在家不

仁，於君則盜。」說明了一個人在家如能先以孝為本，進而方能移孝作忠，忠於國、忠於君。《辯才家教·六親章》：「立身須行孝，家務亦殷勤。出門求諸事，先須啟二親。善言勝美味，含笑莫懷嗔。好兒與眷屬，婢婦和六親。為人莫驕慢，為禮莫因循。侍奉莫辭苦，禮業莫辭辛。」說明了孝為立身之本，而家正是孝行的實踐場所，雙親正是孝行的施敬對象。《太公家教》：「孝子不隱情於父，忠臣不隱情於君。君濁則用武，君清則用文。」「事君盡忠，事父盡孝。」「孝子事親，晨省暮參，知飢知渴，知暖知寒，憂則同戚，樂則同歡。」將盡孝的細節、行為如同家規條列式地，講述得鉅細靡遺。

三綱五常講的就是人際之間的份紀與秩序，人倫關係確定了，家庭自然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夫婦和睦。因此，人倫關係乃是一切社會秩序的綱紀。敦煌蒙書中論及人倫關係的比重佔了總體的大半以上，以下重點摘錄、分述如下：

(3)待平輩的「恭敬」

「恭敬」的對象是兄長，中國俗諺有一句話：「長兄如父，長嫂如母」。此語涵蓋這兩個層面：一者，比自己年長者，對其恭敬是基本的禮貌。二者，道出了家庭是中國社會組成的最基本核心，而維持這個核心穩健運作的精神正是「長幼有序」的人倫關係。《百行章·傷行章》：「不得濫碎之言，輕示忤上。父母之床，理不合坐；兄嫂之床，無宜輒棄。若父母、兄嫂在坐，兄弟悉立，有命須謝謝。在尊之前，不可受卑者拜。縱有殊才異能，亦不得輒言。」說明嚴守禮儀，孝順父母，敬奉兄長乃需於日常生活中加以實踐。《百行章·義行章》：「為人之法者，貴存德義。居家治理，每事無私。兄弟同居，善言和喜。好衣先讓，美食后之。富貴在身，須加照恤。飢寒頓弊，啜味相存。」說明兄弟之間的關係要兄友弟恭，彼此禮讓。《太公家教》：「弟子事師，敬同於父，習其道術，學其言語，有疑則問，有教則受。」此段將五倫外的師生關係做了一個重點強調，這可與俗諺「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做一呼應。

(4)待平輩的「和睦」

「和睦」的對象是夫妻與同輩，「夫妻關係」，雖無血緣的聯繫，但是卻比具有血緣關係的兄弟來得更為緊密。在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下，所謂

夫妻關係乃為單向的「婦道」關係，對於女方的要求遠遠勝於對男方的要求，此點將於下一章節另加說明，現將蒙書中提及夫妻相處之道的地方引例說明。《百行章·棄行章》：「夫婦之義，人倫所先。好則同榮，惡則同辱。不得觀其花蕊，便生愛重之心；一旦衰零，方懷棄背之意。若犯七出之狀者，不用此章。」此章以男性為訓示對象，要求為人夫者該謹守「夫道」，對於當時的女性給予了較高的尊重。

姻親關係中，最難處理的該屬妯娌關係了，這是一種姻親乘以姻親的特殊關係。《辯才家教·善惡章》：「學士問辯才曰：何名為善惡？辯才答曰：居家何以逆？兄弟妯娌無知識。居家何以義？兄弟妯娌相委記。居家何以惡？兄弟妯娌不相托。居家何以好？兄弟妯娌不相道。居家何以分？兄弟妯娌不相遵。居家何以貧？兄弟妯娌不殷勤。居家何以富？兄弟妯娌相倚付。居家何以賤？兄弟妯娌相饒□。居家何以貴？兄弟妯娌常歡喜。居家何以破？兄弟妯娌爭人我。居家何以成？兄弟妯娌有恩情。居家何以失？兄弟妯娌相啾唧。居家何以委？兄弟妯娌如魚水。」藉由十三問、十三答的方式，清楚說明了兄弟妯娌之間的相處之道。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發現，除了血親之間的直系人倫關係是中國傳統以來所注重的，姻親關係因為缺乏父子天性的血緣基礎，因此在維繫彼此之間的和諧關係上，就更加不容易了。從上引例證看來，妯娌關係若要維持和睦，「長幼有序」仍是必須遵守的大前提。

(5)「人倫關係」的綜論

因為敦煌蒙書在體裁上，兼有詩歌、韻語與家訓的特色。故其在闡論許多觀點時，總是採以微言大義、概括論述的方式。在闡述一個主題時，所涉及的層面是多元的，有時很難將其單純的歸為某個類別。如《開蒙要訓》：「孝敬父母，承順兄弟。翁婆曾祖，嫂侄孫嬰。伯叔姊妹，姑姨聘嫁，夫婦媒成。油燈蠟燭，炬照輝盈。貧賤富貴，奴婢使令。」綜論了父子、兄弟、婆媳之間的人倫關係與相處之道，還特別強調為人媳婦的基本「婦道」。《百行章·恭行章》以相當大的篇幅來教導民眾行為必須合乎禮法，對於身份、等級、地位高於己者必須恭敬：「入公門斂手而行，在公庭鞠躬而立，對尊者卑辭而言。二親在堂，不得當門而佇；國有明君，不得當街而蹈。縱居私室，恒須整容；至於妻子之間，每加嚴格。終日畏天懼地

怕君者，是為恭行。」強調為人之道需嚴格遵奉等級制度，恪守上下尊卑秩序。《太公家教》：「明君不愛邪佞之臣，慈父不愛不孝之子。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反映家是國的基本組成，對家庭成員的教育就是為國家統治服務的做準備。

(二)修身養性

蒙書中還提及教人立身處世、講究禮儀、賞罰分明、知恩圖報、勤力奮進等教育思想，亦從家長的角度涉及到如何以身作則教育子女的問題。《雜抄》中還有很多有關生活行為與日常交往中應注意的事項，如：「世上略有十種割室之事」、「十無去就」、「五不達時宜」、「五無所知」、「五不自思度」、「六痴」、「八頑」等，均以為告誡人們於日常生活中常常忽略的瑣事。此外，《雜抄》中〈辯金藏論法〉一段，開頭即云：「夫人有百行……」，接著將修身之道的孝、信、謙恭、悌、包容……等，為人該具備的基本德行論述了一段。由於一個人的修為層面極其多面，因此本文僅就幾項特點以為引述：

1.忍

在敦煌蒙書中，有著許多教人「守弱」的道家思想，有時勸人退一步思考，有時勸人三思而後行，倒是很難硬性歸類為道家、儒家亦或是釋家思想，筆者因此以一「忍」字蓋而論之。《百行章·忍行章》：「有人談好，未可即喜；有人道惡，未可即嗔。勿信饞言，莫言佞語。佞語侵人，飲氣忍之，縱有道理，安詳分雪。不得態其三毒，返燒其身。若不能忍，禍患交至。梁人灌楚，尚致二國之和；宋就忍之，乃獲安幫之樂。」說明小不忍則傷身，大不忍則禍國的利害關係。《雜抄》：「論忍事。天子忍之成其大，諸侯忍之國無害，吏人忍之名不廢，兄弟忍之則歡泰，夫妻忍之終其代，身躬忍之無患害。論不忍事。天子不忍群臣疏，諸侯不忍國空虛，吏人不忍刑誅罰，兄弟不忍別異居，朋友不忍情義疏，夫妻不忍令子孤，小人不忍(喪)其軀。」通過正反兩相對比，說明忍耐的益處與不忍的後果。《太公家教》：「羅網之鳥，悔不高飛；吞鉤之魚，恨不忍飢；人生誤計，恨不三思；禍將及己，悔不慎之。」又：「太公未遇，釣魚於水；相如未達，賣卜於市。巢父居山，魯連赴海，孔明盤桓，候時而起。」利用譬喻、史事實例來說明忍則海闊天空，退一步並非認輸、放棄，而是「候時而起」。

這一段同時蘊意著道家的守弱思想，又同時具備了儒家積極進取的企圖心。

2. 儉

勤、儉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持家的美德。在地處邊陲的敦煌地區，物質資源遠遠不如中原地區的富庶，因此，對於儉的重視，當更勝於中原地區。《百行章·貴行章》反映了唐初以農為本，躬行儉約的經濟思想：「性之不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必須營之。是以金銀飢不可食，珠玉寒不可衣。粟帛之重，莫能過者，但以立國存家，唯斯之甚。」農業為立國之本，粟帛比金銀珠寶更為重要，而且還必須去奢省費，躬行儉約。《百行章·儉行章》：「藏如山海，用之有窮；庫等須彌，還成有乏。儉者恒足，豐者不盈。在公及私，皆須有度。事君養親，莫過此要。」《雜抄》：「豐年珠玉，不如儉年麥粟。在豐慮儉，在飽慮飢。」告誡子孫，要有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警覺。太宗曾謂侍臣：「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¹³

3. 慎

漢民族是一個保守的民族，俗諺「小心駛得萬年船」、「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都是要求為人處世得事事小心，對人、對事都必須小心以對。《百行章·慎行章》：「立身終始，慎之為大。若居高位，即須慎言。朋友交游，便須慎杯。養身之道，便須慎食。就醫療疾，乃可慎醫。」用一「慎」字貫穿全文，從個人生活行為到立身處世，都明確地例舉說明。《太公家教》：「教子知法，常令自慎，勿得隨宜，言不可失，行不可虧。他籬莫驀，他嫌莫道，他事莫知，他貧莫笑，他病莫欺，他財莫願，他色莫思，他強莫觸，他弱莫欺，他弓莫挽，他馬莫騎。弓折馬死，償他無疑。」這一段戒子文，如同《崔氏夫人訓女文》一般，以一連串的否定語氣，告誡其子弟，唯有事事謹慎小心，方能明哲保身。《武王家教》利用武王與太公的問答體式，藉由彼此的對話說明為人所該注意的「一錯」、「二誤」、「三痴」、「四失」、「五逆」、「六不詳」、「七奴相」、「八賊」、「九愚」、「十狂」。而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人能在社會中平安、守禮、依法地生活。

4. 勤學

¹³ 《貞觀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八。）

敦煌地區的教育如此普及，與唐代的科舉制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甚至有專為應舉而編寫的蒙書，如《兔園策府》。故不管是士族大家，或是平民百姓，無不希望自家子孫能夠藉由科考及第而光耀門楣，故對於勤學的重要，是為人師、為人父母所一再耳提面命的。《百行章·學行章》：「良田美業，因施力而收；苗好地不耕，終是荒蕪之穢。人雖有貌，不學無以成人。但是百行之源，凭學而立，祿亦在其中矣！」說明勤學不但是可以學得知識與德行的培養，進而可以學而優則仕，體現出當時一般人民的社會心態，儼然成為儒家思想的最佳宣傳者。《太公家教》不僅強調學習的重要，而且還蘊藏終身教育的思想在其中：「近鮑者臭，近蘭者香；近愚者暗，近智者良。明珠不瑩，焉發其光？人生不學，言不成章。小兒學者，如日出之光；長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日暮之光；老而不學，冥冥如夜行。」簡單的幾句話就說明了盡早學習的重要性，體現了唐人要求子女勤奮治學、珍惜光陰的教育思想。王梵志的詩也屢屢提及要重視教育孩子讀書：「養子莫徒使，先教勤讀書。一朝乘駟馬，還得似相如。」王梵志強調知識的價值和學習的重要性，卻也暗示著高官厚祿乃讀書的終極目標。《雜抄》：「論始欲學之事。昔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六十，始欲學道，恐年將暮矣，如之何？』師曠對曰：『小而學者，由日出東；長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燈焰之光。人生不學，冥冥如夜行。』」這段強調勤學重要的文字，居然和上述《太公家教》的文字一模一樣，也突顯出敦煌蒙書的彼此學習、借用、模仿的特性。

5.禮

因為敦煌蒙書具有很強烈的時代性與地域性，加上其施教對象絕大部分為文化水平較低的庶民階級。因此，對於於日常生活中所必須恪遵的禮教觀念，就刻意地被編寫者納入教材之中。在唐代，禮學具有思想指導意義，太宗與群臣強調以禮制約各種社會關係，以禮維護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以禮制律，刑禮相輔而行，一方面把禮學作為制定與修改律令的指導思想，一方面以刑拯禮之失，維護禮學，以禮作為政治准則，調整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關係。¹⁴《太公家教》：「立身之本，義讓為先。」又：「其父

¹⁴ 陸離，〈敦煌本《百行章》所反映的唐初統治思想〉，《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頁97。

出行，子須從後，路逢尊者，齊腳斂手。尊者賜酒，必須拜受；尊者賜肉，骨不與狗；尊者賜果，懷核在手，勿得棄之，違禮大醜。對客之前，不得叱狗；對食之前，不得唾地，亦不得漱口。」在教人日常生活必須注意的禮儀之後，還不忘於其後加上一句「憶而莫忘，終身無咎」來加強其重要性。同書：「與人共食，慎莫先嘗，莫先舉觴；行不當路，坐不背堂；路逢尊者，側立路傍；有問善對，必須審詳。」從上述一段，與此段內容，可以發現《太公家教》對於敬老特別重視，此點與該書書名正好相呼應。

五、女子教育

「禮教」是中國傳統教育的中心，六倫的規範將古代的道德標準，明確地建立了一套社會的集體意識。《禮記》的〈曲禮〉、〈郊特牲〉、〈內則〉、〈昏義〉、〈昏禮〉五篇，將女子一生的行事準則全部概括揭示。因此，敦煌的女子教育作品乃至有唐以來的女子教育觀點，多承襲《禮記》而來。然而，婦女實際生活所處的地位，除卻禮教的影響外，還受到當時時代發展與社會風氣等人文因素的作用。就唐代女性群體而言，她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仍是一個男性居統治地位的傳統社會，女性無論在家庭和社會上，地位普遍低於同時代的男性群體。許許多多表面看似女性地位提昇的表象，實際卻依然掌握在男性或是長輩的手裡。¹⁵

唐代女子教育除宮廷習藝館外，並無正式制度。至於民間婦女的知書識字、能文習詩者，則率由私學得之。唐代民間私學甚為發達，婦女或受母訓，或受姆教。因此「女訓」一類的作品，一時蜂出並作，據歷代史志所載，有《女則要錄》、《古今內範》、《武后訓記雜載》、《內範要略》、《鳳樓新誠》、《女論語》、《女誠》、《內訓》、《女孝經》、《女儀》。由此類女訓作品觀之，唐代女子教育教育重心，無非教導婦女貞節、柔順、卑弱、賢德以及各種女工的學習，以為將來奉事翁姑、相夫教子預作準備。¹⁶

唐代「女戒」這些作品，大抵可以區分為：「皇族家訓」、「士族家訓」、「庶民家訓」三類。唐代皇室家訓中有關女子教育者，在太宗《帝範》一

¹⁵ 王溥《唐會要》卷八三：「……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必須申以婚媾，令其好合。」長孫無忌《唐律疏議·戶婚下》：「諸夫喪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強嫁者，徒一年」、「婦人夫喪除服，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奪而強嫁之」。

¹⁶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415-416。

書略有提及，而《女則要錄》、《古今內範》、《內範要略》、《鳳樓新誠》等專門的女教作品，皆名存而內容亡佚，其餘可考者多為唐國君於公主出嫁時對公主的教誨文書。¹⁷屬於士族家訓的作品，有陳邈妻鄭氏《女孝經》¹⁸、李華〈與外孫崔氏二孩書〉¹⁹、韋應物〈送楊氏女〉²⁰、李晟〈戒女言談記錄〉、李商隱〈義山雜纂〉。庶民家訓作品有宋若莘《女論語》、《武王家教》、《太公家教》、《辯才家教》、《崔氏夫人訓女文》。²¹敦煌蒙書即屬於庶民家訓類，茲分述例舉說明。

《崔氏夫人訓女文》是唐朝末年流行於敦煌民間的一種通俗讀物，其性質為古代「婦道教育」類的作品。題名「崔氏夫人」則是托名唐代當時中原地區的大家望族²²。其文辭通俗，筆調活潑流暢，內容形象生動，很容易為廣大民眾與文化水平相對較為低落的女子所接受。《崔氏夫人訓女文》的內容為母親於女子出嫁時的諄諄告誡與訓示。茲錄全文如下：

香車寶馬競爭輝，少女堂前哭正悲。合今勸汝不須哭，三日拜堂還得歸。教汝前頭行婦禮，但依吾語莫相違。好事惡事如不見，莫作本意在家時。在家作女慣嬌伶，今作他婦信前緣。欲語三思然后出，第一少語莫多言。路上逢人須斂手，尊卑回避莫擋前。外言莫向家

¹⁷ 『〈冊建平公主文〉：「咨爾建平公主，秉質尚柔，因心克順。」』、『〈冊臨晉公主文〉：「咨爾臨晉公主，蹈和成性，體順為心，頗協生知之敏，更承師氏之訓，柔明益著，淑慎攸彰。」』、『〈冊真陽公主文〉：「咨爾真陽公主，柔順因心，幽閑表質。」』、『〈冊興信公主文〉：「咨爾興信公主，自幼及長，含和尚柔。」』、『〈冊樂成公主文〉：「咨爾樂成公主，毓質柔明，秉性婉閑，幼彰惠問，長有令儀。」』、『〈冊壽光公主文〉：「咨爾壽光公主，敏質柔閑，質性純粹，芳衿內穆，淑問外宣。」』、『〈冊平昌公主文〉：「咨爾平昌公主，性質閑婉，襟靈敏悟，柔順外徹，和惠內融。」』、『〈冊廣寧公主文〉：「咨爾廣寧公主，柔儀明婉，淑性和惠，端閑外肅，敏悟內昭。」』、『〈冊華陽公主文〉：「咨爾第某女承徽，自遠誕秀增華，仁孝才明。」』以上諸冊文，表面上在顯示諸公主的柔順特質，卻也隱含著皇帝對其女兒的期許。

¹⁸ 全書共分〈開宗明義〉、〈后妃〉、〈夫人〉、〈邦君〉、〈庶人〉、〈事舅姑〉、〈三才〉、〈孝治〉、〈賢明〉、〈紀德行〉、〈五刑〉、〈廣要道〉、〈廣守信〉、〈廣陽明〉、〈諫諍〉、〈胎教〉、〈母儀〉、〈舉惡〉十八章。內容以道德教訓為主。

¹⁹ 內容乃李華告誡其二外孫女，要善修婦教，勤讀書，明事理。

²⁰ 為五言古詩，共 24 句，120 字，乃韋應物送女歸於楊氏時所作。

²¹ 林偉琿，〈唐代家訓所表現的女子教育觀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²² 唐時中原的五大姓為：崔、盧、李、鄭、王，時人以能與此五大姓聯姻而視為榮耀。

中說，家語莫向外人傳。姑章(嫿)共語低聲應，小郎共語亦如然。早朝堂上起居了，諸房伯叔並通傳。妯娌相看若魚水，男女彼此共恩憐；上和下睦同欽敬，莫作二意有慵偏。夫婿醉來含笑問，迎前扶持送安眠；莫向人前相辱罵，醒后定是不和顏。若能一一依吾語，何得翁婆不愛憐。故留此法相教示，千秋萬古共流傳。

全文以告誡的語氣，訓示即將出嫁的女子以夫家為貴，認清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內容有如後述《雜抄》所講三從四德的註解與說明版。這些女戒性質的讀物，對當時女子教育的影響絕不下於經典中講忠論孝的微言大義。

除了《崔氏夫人訓女文》題目明確標名為女子教育讀物之外，另有《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辯才家教》等家教類蒙書。既為家教，則兒子、女兒應當共同授之。故本文茲將其中專對女子所言部分提出，以利讀者審視。《太公家教》：「育女之法，莫聽離母。女年長大，莫聽游走。女人游走，逞其姿首，男女雜合，風聲太醜，污染宗親，損辱門戶。婦人送客，不出閨庭；所有言語，下氣低聲；出行逐伴，隱影藏形；門前有客，莫出聞聽；一行有失，百行俱傾；能依此理，無事不精。新婦事君，同于事父；聲音莫聽，形影不睹。夫之父兄，不得對語。孝養翁婆，敬事夫主；親愛尊卑，教示男女；行則緩步，言必細語；勤事女功，莫學歌舞；少為人子，長為人母；出則斂容，動則庠序；敬慎口言，終身無苦。希見今時，貧家養女，不解絲麻，不嫻針縷，貪食不作，好喜游走；女年長大，聘為人婦，不敬翁家，不畏夫主；大人使命，說辛道苦，夫罵一言，反應十句。損辱兄弟，連累父母，本不是人，狀同豬狗。女慕貞潔，男效才良。養男不教，不如養驢；養女不教，不如養豬。痴人畏婦，賢女敬夫。」文中對於女子於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孝養翁婆、敬夫、勤事女功等各方面皆有嚴格的規範。有趣的是其中還直接引用《千字文》中的「女慕貞潔，男效才良」句子。《武王家教》：「男教學問，擬待明君；女教針縫，不犯七出。當莫用佞言，治家莫取婦語。」《辯才家教》：「學士問辯才曰：『貞女之門如何？』辯才答曰：『貞女聘與賢良，謹節侍奉姑嫜。嚴母出貞女，嚴父出賢良。侍奉殷勤莫虧失，免令損辱阿娘。身體髮膚須保愛，父母千金莫毀傷。勸君審思量，莫護短，必壽長。內得外，莫稱揚。行善巧，必無殃。積行惡，招不祥。依律呂，合宮商。但取弱，莫爭強。勤節省，必

餘糧。無失錯，大吉昌。』」將女子的德行與孝道作了一個緊密的聯繫，並將對於一般要求的孝道標準「身體髮膚授之父母，不敢毀傷」，擴大層面的應用於女子的教育之上。《雜抄》全文約五千字，主要採取問答形式，內容涉及廣博，包含天文、地理、歷史、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基本知識，其中涉及女子教育的內容如：「論婦人『四德』、『三從』。何名『四德』？一、婦德，貞順；二、婦言，辭命；三、婦容，婉悅；四、婦功，絲麻。何名『三從』？婦女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孔子備問書》雖被歸屬於知識類蒙書，但其中仍不乏涉及女子教育的內容：「問曰：『何謂婦人「七出」？』一無子，二口舌，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竊，六妒，七惡疾。但犯一條即合棄之。若無七出，口棄之徒一等。何名『三不去』？一曾持舅姑之服，二取賤後貴，三有所取無所歸。難犯七出，不合去之，違大一等。若犯奸及惡病由士棄之。問曰：女家有四不可娶何？弟一不孝，二始多病淫色有生離之類，三及逆不順，四寡婦長養女無禮，此之是也。」將規範女性的最嚴格標準「七出」、「三不去」、「四不可娶」列為婦道的準則。《百行章·貞行章》：「雖遭亂代，不為強暴之勇；俗有傾移，不奪恭姜之操。秋胡賤妾，積記傳之；韓氏庸妻，今猶敬重。婦人之德，尚自而然；況乃丈夫，寧不刻骨？」以歷史人物為一模仿對象，這同其他講史類蒙書的體制與功能有異曲同工之妙。

從上述女子教育的讀物中，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此類讀物在語氣訓示上，總結於一個「戒」字，受教者屬於消極遵守的被動角色，不同於其他針對孩童或是弟子、一般民眾的蒙書教材，是屬於積極實踐的主動角色，從字裡行間也就不經意地流露出男尊女卑的傳統教育思想。

敦煌「女戒」蒙書的內容，可分為「道德規範」與「生活智能」兩大面向，而自古迄今普遍遵循的「三從」、「四德」，則分別以不同的戒規與體現方式來約束著古代婦女的言行舉止。²³總而言之，敦煌女子教育的教材，在體裁上較為簡潔單純，易讀易懂，多用四字句、六字句的詩歌形式。而在道德規範的教育觀點，不外乎「孝、賢、慈、節」。所以，我們不難

²³ 林偉琿，〈唐代家訓所表現的女子教育觀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此文將其細分為出嫁前的道德規範：事父母、行為中矩、嚴防男女、莫道短長。出嫁後的道德規範：事公婆、事夫、和親睦族。生活智能：教養子女、持家、學作女紅。分述詳盡，可供參考。

發現，敦煌的女子家訓類作品，其內容仍然強調傳統的「三從四德」，對於女性的角色定位，依舊脫離不了男性的依附曲從。

六、結語

敦煌蒙書以其多元的體制與內容，在整個中國傳統蒙書的發展歷史上，扮演著極為關鍵性的角色。多位學者以當今的教育理論與課程、教材編纂原理來批評當時的這批童蒙讀物，攻訐其中偏重倫理道德教育，充滿了對封建統治階級倫理道德的說教、男尊女卑的歧視，滲透著封建文化中極其腐朽的思想毒素……等，實在是有欠公允。站在法制史的觀點，政與教、刑與法是相輔相成的。唐代法典的完善，促使律令的執行更趨於規範和合理，唐代的法制思想也就顯得尤為突出，並且人為的滲透於各種典籍當中，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為其統治服務的。而蒙書的內容也毋庸置疑地體現它作為統治者御用工具的一面。敦煌蒙書雖僅是訓蒙讀物，但從各方面反映了唐統治階層奉儒學為正統、以禮法維護封建等級制度、以民為本、刷新吏治、任賢選能、提倡忠諫、標舉孝行、寬仁慎刑和崇奉三教的統治思想。

敦煌蒙書的編著宗旨，大部是為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統治制度的統治服務的。如《百行章》序文：「雖讀不依，徒示虛談，何益存忠？則須盡節立孝，追遠慎終。至於廣學不仕明朝，侍省全乖色養；遇沾高位，便造十惡之衍；未自勵躬，方為三千之過。臣每尋思此事，廢寢休餐，故錄要真之言，合為《百行章》一卷。」由此可見，要為統治者培養出符合時代需求的人才，首先要使受教育者在思想上予以重視，即受教育者要成為「忠孝節義，清廉寬信」的人，必須從小受到正統的思想教育。²⁴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敦煌蒙書的集權思想、價值觀的侷限，都可視為理所當然的現象。

敦煌蒙書縱使內容豐富、體制多元、教化蘊意深遠，但是其文字編寫十之八九皆為「條列式」、「標題式」、「例舉式」的，並無長篇大論的說明、註解與申論，主要還是歸因於其為「教材」的體式與「啟蒙」的性質。一套完整的教育流程且能達到教育目的，就必須是「中心思想」+「教材」+「受教者」+「施教者」。而本文所論述的儒教道德即中心思想，本文所論

²⁴ 參閱僧海霞，〈從敦煌本《百行章》看唐初的法制思想〉，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第14卷第1期，2006年3月。

述的敦煌蒙書即教材，啓蒙即爲受教者的本質特性。而上述蒙書所具的「條列式」、「標題式」、「例舉式」這些特點，正是應「施教者」而成。正因上述特點，「施教者」方能就內容的多寡、講解的深度、涉及的層面與受教者的程度而做調整與控制。也因此，敦煌蒙書並非內容粗淺、俚俗，而是給「施教者」更大的自主與應用空間，套句現代名詞，即教師更具「教學自主性」。

周谷城《傳統蒙學叢書》序言中寫道：

我們研究文化史，應當著眼全民族和各階層人民文化的演進，著眼以往各時各地社會上多數人的文化狀況。所以，研究唐五代文化，除了《北堂書鈔》、《監本九經》，還不妨研究研究今存《兔園冊》殘篇；研究宋代文化，除了《困學記聞》、《劍南詩稿》，也不妨研究研究《三字經》和《百家姓》。雖然《兔園冊》不必為虞世南所編，《三字經》不必為王應麟所撰，而且《三字經》也不一定只為村夫牧子誦讀，但當時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們通過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觀、神道觀、倫理觀、道德觀、價值觀、歷史觀，在這類書中，確實要比在專屬文人學士的書中，有著更加充分而鮮明的反映。²⁵

通過以上對敦煌蒙書初略的分析與探討，可以發現儘管距今已千餘年的蒙書在其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在其灌輸知識的外衣下，在其名為「家教」、「家訓」的框架下，所深藏其中的教化蘊意，並不遜於聖人名士的經典史傳，更不亞於藝文志、經籍志中的史傳書目。而其以粗淺的文字、平易的內容、通俗的生活習俗與觀念的表達方式，透過塾師、父母、朋友的口傳身教，讓其中的倫理道德思想在不知不覺中深固於人心。這也正是敦煌蒙書在教育上所表現出其他任何文體與教本所無法達到的極端滲透力。更爲我們在思維當今教育政策與教材編寫時，提供了最好的借鏡。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1.雷僑雲，《敦煌兒童文學》，臺北：臺灣學生，1985 年。
- 2.毛禮銳、邵鶴亭、瞿菊農，《中國教育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89 年 9 月。

²⁵周谷城，《傳統蒙學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6 年，3 月。

- 3.張志公，《張志公文集(4)傳統語文教學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
- 4.林文寶，《歷代啓蒙教材初探》，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6年。
- 5.朱鳳玉，《敦煌寫本碎金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 6.鄭阿財、朱鳳玉撰，《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
- 7.鄭阿財、朱鳳玉，《開蒙養正--敦煌的學校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

二、論文

- 1.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漢學研究》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號，1986年12月。
- 2.汪泛舟，〈敦煌的童蒙讀物〉，《文史知識》，1988年8月。
- 3.李貴潔，〈略論我國古代蒙學的倫理教育特點〉，《教育研究》，1998年第5期。
- 4.何錫章，〈中國現代文學「啓蒙」傳統與古代「教化」文學的相關性論綱〉，《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
- 5.錢加清，〈我國古代蒙學教材特點檢析〉，《語文學刊》，2001年第4期。
- 6.陸離，〈敦煌本《百行章》所反映的唐初統治思想〉，《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 7.顏佳琪，〈中國古代蒙學教材的發展狀況及其特點〉，遼寧：《教育研究》，2001年，第9期。
- 8.林偉琿，〈唐代家訓所表現的女子教育觀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 9.胡德忠、王斌，〈中國古代蒙學教材的學科特徵〉，《湖北成人教育學院學報》，第9卷第1期，2003年1月。
- 10.張永萍，〈敦煌古代教育思想芻議〉，《文化教育》，第34卷第2期，2005年。
- 11.趙跟喜，〈敦煌唐宋時期的女子教育初探〉，《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
- 12.僧海霞，〈從敦煌本《百行章》看唐初的法制思想〉，《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第14卷第1期，2006年3月。
- 13.羅宗濤、任允松，〈敦煌蒙書的時代性〉，《敦煌學輯刊》，第27輯，2008年2月。